

孔子儒學與當代社會文集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会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 编

齐鲁书社

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集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会 编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

齐 鲁 书 社

1991年

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集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会 编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汶上县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5.5印张 2 插页 384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232—X

B·47 定价：8.20元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匡亚明 金景芳 宫达非
辛冠洁 张 健 宋法棠

主 任：徐宝庆

副主任：陈信泰 李启谦 李金山
姜林祥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元	王钩林	邓承奇
许凌云	李启谦	李金山
陈信泰	苗润田	姜林祥
骆承烈	徐宝庆	黄清源
韩廷明		

《孔子研究丛书》序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孔子思想和由孔子奠定其基础的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远播东亚、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开展东西方尤其是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和人类的进步、和平、发展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校设学孔子故乡，幸得地利之便，研究孔子、儒家与有重任，推动研究继续向前发展责无旁贷。共识及此，校孔子研究会乃决定组织撰写《孔子研究丛书》，欲于今日专心致志，勤勉敬业，发愤进取，力争上游，期待来日作出更大贡献。

这套《丛书》规模颇大，分为“专著类”、“资料类”和“工具书类”三个系列，既有比较高深的学术研究著作，又有各种专门的编次之作。几乎涉及孔子、儒家研究的一切主要方面，重点则是探讨孔子、儒家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也不排除采用其他科学的方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学风须严谨、扎实，做到科学性、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体裁、形式则力求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全面开展孔子、儒家思想研究，乃是一项长远的、艰巨的和光荣的科学事业，也是一项培养人才、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丰富人类思想宝库的义举。我们既以为己任，自当竭诚努力，夙夜匪懈；然而任重道远，恐非一校一地之力所能支持。所以我们除了立足本校以外，还要走出校门，面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专家学者暨社会各界人士，广泛结交朋友，积极寻求合作，会同各方志趣与我相若的载笔之士，群策群力，玉成其事。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一切愿意参加《丛书》撰写的专家学者，无论校内外或海内外，也无论采取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都将受到我们一视同仁的诚挚欢迎！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会
《孔子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0年3月于曲阜

编 者 说 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论文集，是根据“孔子、儒家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选编而成的。

“孔子、儒家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是由曲阜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山东分会联合发起，于1989年10月12日至16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举行的。与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达一百二十多人；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匡亚明、孔德懋、金景芳及丹麦、南朝鲜学者柏思德、金丁镇应邀出席了会议。陈立夫先生从海外寄来了祝贺信和学术论文。由于适逢孔子诞辰2540年纪念，学者们以文会友，兴致特高。大家围绕着孔子、儒家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热烈认真、广泛深入的讨论。交流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共收到论文七十余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集子只能收录其中的一半左右，这是需要向作者表示歉意的。另外，被收录的论文，一般未作改动，只有个别作了某些删节。

本论文集是经有关专家讨论后，由我校《齐鲁学刊》编辑部王钧林同志编辑而成的。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会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

1990年5月26日

目 录

- 近年来孔子研究述评……………李启谦（1）
- 论儒学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赵吉惠（16）
-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钱 逊（52）
——中国传统人生价值学
- 儒家的伦理思想和当前历史阶段的道德培植……张季平（52）
- 孔子仁学与当代国际社会……………葛 亮（61）
- 孔子“仁”的教育思想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罗佐才（67）
- 孔子心理卫生思想与精神文明建设……李国榕 孟万金（77）
- 中西法文化的一个比较：“自然法”与
“伦理法”……………俞荣根（91）
- 论传统的阳儒阴法结构及新检讨……………吴长庚（110）
- 孔子人道思想，本乎天道，故能形成道统，
以救世界……………陈立夫（125）
- 儒学、当代社会与中国……………柏思德著 刘世生译（137）
- 孔子仁爱大同思想与孙文三民主义哲学……………金丁镇（155）
- 孔子管理思想述略……………张宗舜（165）
- 孔子是中国古代领导学的奠基人……………骆啸声（189）
- 孔子人才管理思想探讨……………李如密 韩延明（205）

简谈孔子的“庶、富、教”社会管理思想	颜景琴	(219)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前的教育改革	杨焕英	(227)
孔子的教育方针对今人的启发	骆承烈	(236)
试论孔子教学中的思维训练	陈信泰 李如密	(244)
孔子民主教育思想初探	王卓民	(253)
孔子的自我教育思想初探	张良才 修建军	(266)
荀子的学习思想探析	陈德安 申国昌	(276)
试论儒家的道德教育专著——《儒行》	罗裕祥	(294)
孔子哲学思想述评	周立升 丁原明	(303)
孔子的人生哲学	何植靖	(322)
礼——仁——中庸	张秉楠	(335)
——孔子思想的演进			
礼与周代思想家的精神特质	许志刚	(350)
孔子文质思想概述	侯宪林	(366)
试论孔子思想中的和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	李栋柱	(376)
“仁”辨析	李景明	(386)
论仁的生命本体意义	杨佐仁	(395)
孔子、韩非的仁学的比较研究	杨绍溥	(412)
孔子思想与人的发现	燕国材	(422)
试论孔子思想的开放性倾向	张颂之	(433)
孔子评人与孔子其人	黄瑞琦	(446)
阳虎和孔子	孔令彬	(460)
孔子、儒家思想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	李洪淳	(472)
——以汉唐儒学及朱明理学为例			

近年来孔子研究述评

李启谦

本人在1986年底曾写过与这一题目相同的文章（见《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4期），那是概括的1979年至1986年那段时间内孔子研究的一些情况。近三年来的研究又有很大变化。为了让大家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动态，现在一并综合起来介绍如下。

一、基本情况

孔子研究的情况和形势，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出现新气象和新特色。

1. 学术界出现了相互尊重的新气象。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因观点不同而闹不团结的现象。这一情况的存在妨碍了研究活动的正常进行。大家认识到它的危害后，都注意了做团结工作。有的相互邀请参加同一个会议，有的进行相互访问。有的学社成立时，开宗明义就说：“珍惜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提倡宽容精神，赞赏这样的态度：‘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和友谊是连结学社成员的唯一纽带。”（《孔子研究》1988年4期75页）通过大家的努力，不同观点和不同学会的同志们都能相互尊重，虚心听取对方意见，这样就使不团结的现象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进而促进了学术活动的开展。

2. 大型的国际性会议不断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孔子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而且规模越开越大。不过在1986年

以前，还没有一次是国际性的。然而自从1987年以后，国际性的会议就不断召开。如1987年9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在曲阜发起的会议，就有十二个国家参加。同年10月由中华孔子研究所在济宁发起的会议，也有国际友人到会。1987年11月在台湾又举行“国际孔学会议”。1988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在波恩发起的会议，更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参加。1989年10月7日至10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和曲阜两地，发起召开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格高、规模大的国际会议。开会期间，江泽民总书记还接见了国际和海峡两岸的部分代表。这对孔学研究大有推动作用。同年10月12日至16日，又由曲阜师范大学发起召开了“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会上中外学者一起，深入细致地讨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这对提高学术水平大有意义。

3. 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孔子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为了使研究经常化和更有计划地进行，各地就不断建立了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仅我所知在1986年以前建立的学术团体有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研究所、山东孔子学会、山西孔子学会；建立的研究机构有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山东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1987年以后建立的学术团体有苏州市孔子研究会、陕西省周至县孔子学会、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山东省东方文化基金会；建立的研究机构有华东师范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等。几年来建立如此多的学术团体和机构，这确是以前没有的事。

4. 文章、文集和论著不断增多。1984年以前的文章没有统计，但这以后的数字是直线上升的。仅从《全国报刊索引》所收录的文章篇数就可说明这一问题。1984年共发表文章68篇，1985年77篇，1986年78篇，1987年95篇，1988年92篇。除最后一年稍

有回落外，其他年份是一直逐年增多的。

这几年正式出版的文集、论著数量也是波浪式地增多。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1984年4部，1985年8部，1986年5部，1987年9部，1988年13部。不仅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学术和印刷装帧水平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山东《孔子文化大全》丛书的陆续出版，更是出版事业中的一大新事。

5. 文艺作品不断出现，孔子的形象逐渐搬上舞台和银幕。近三年来孔子研究中的一个特点是，艺术家、文学家不断参加到孔子研究的行列中来，其表现不仅是他们研究孔子的文学、语言思想，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很多艺术作品。如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孔子演义》；青岛市文化局1988年曾编写和演出了孔子舞剧《畅想曲》；山东电视台等1989年播出了孔子电视连续剧《孔子》；山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孔子传》。另外，还有一些单位和同志正在编写各种形式的剧本，等等不一。这是以前很少有的一种现象。

6. 很多高等学校安排了有关孔子思想的课程。最近几年据我们所知，在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福建师大、河南大学、曲阜师大等高等学校，都安排了有关孔子思想的课程。这样，孔子研究就进入了高校的课堂。“文革”时期，孔子问题也曾占用过高校很多时间，但那只是“无情的批判”，根本没有科学分析，而现在是平心静气分析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其优秀遗产以为现实服务。这是孔子研究中的新面貌。

二、不断突破关卡，不断扩大研究领域

打倒“四人帮”后，各种问题的探讨逐步展开。开始时多围绕传统的问题发表文章，如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政治思想、天命

观、教育思想、仁、礼、中庸、批判继承、历史作用等等；随之又在一些新领域发表意见，如孔子的经济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思想、心理学、逻辑思想、军旅思想、饮食观、史学思想、文学思想、音乐思想、考古知识、孔子与教学、体育思想、美育思想、孔子与医学、人才培养、孔门弟子、鲁国与孔子、《论语》章句新解等，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不过近二年来，除了继续刊登各方面的文章外，人们更多地注意了孔子思想在当代社会中价值问题的研究，如孔子道德学说与现实世界、孔子的管理思想、孔子思想与当今世界等，这些是目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孔子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和不断突破一些认识上的关卡有很大关系的。

1. 在“讨孔”的迷雾中醒悟过来。在刚打倒“四人帮”后的二、三年内，在批判“四人帮”时，还说他们是“假批孔，真尊孔”。为了和他们划清界限，就提出必须“真批孔”、“真讨孔”，好像孔子是历史罪人的结论是定了似的，谁也不应再有别的议论。后来人们才发现，我们和“四人帮”的区分，不是真批假批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的问题。对孔子态度的这一转折，对研究孔子有极大的推动。这大约是1979年前后的事。

2. 突破了道德问题的禁区。因为鲁迅曾把封建礼教概括为“吃人”，而又把孔子当成是封建礼教的祖师爷，所以在长时期内，人们就把孔子提出的伦理道德问题也视为禁区，好像孔子的别的问题，都可讨论和重新评价，唯独他提出的伦理道德问题，只能是“吃人”，不能再作别的认识。但是，1981年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也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它不全是“吃人”的东西，而是也有合理的因素。在这时期发表了一批文章，主要观点是，有些是糟粕，有些还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有些要批判，有些还应继承。这个禁区被打开后，孔子的研究就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了。

3。孔子思想阻碍现代化的问题受到了重新认识。孔子轻视科学技术，提倡信而好古，在他的思想中缺乏开创精神，缺乏竞争观念，缺乏商品意识，因之，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阻碍”（见《孔子再评价》）。这一结论是学术界长期的一种认识。但是近几年来人们对此有了不同看法。

第一，新加坡在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感到西方的道德沦丧，不利社会安定。李光耀就认为：“新加坡人太西化，必须重新发扬东方美德来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孔子研究》1986年1期118页）这就使人感到儒家思想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中，也还有一定用处。

第二，对孔子给以尊重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反思。赫尔曼·凯思就认为：“也许儒家思想在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要比西方文化有价值。”（《1979年以后世界经济发展》伦敦1979年）后来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了新的议论：“既然它们（四小龙）的经济在现代能出现高速度增长，又怎能断言儒家思想纯然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消极因素呢？”（《孔子研究》1989年1期26页）。提出问题的学者们，就是认为儒家思想也能和现代化一致起来。

第三，儒家管理思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管理问题有社会管理、教育管理、企业管理等等不同的种类和层次。继承儒家思想中某些社会和教育管理思想，人们是容易接受的，然而用儒学思想来管理企业，则是不易理解的新问题。可是在这方面，在日本有成功的例子。稻盛和夫“对运用儒家思想经营企业颇多发挥”（见《孔子研究》1989年1期37页）。另外，“儒家思想对丰田企业来说简直具有传家思想的性质”（见《孔子研究》1989年1期37页）。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思索。既然对现代化企业管理有如此大的用处，那么就应当承认对现代社会也会有用处。这个

问题，先是在国外引起重视，现在在国内也受到了注意。这样，孔子研究的领域就更广泛更深刻更有现实意义了。

三、研究方法有了新进展

任何言论、文章、学说和学科，都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也都有一定的分析方法作为认识问题的工具。近几年来，在孔子研究的方法上也有新发展。

1. 用二律背反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评价孔子。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认为，两个命题是相互排斥的，但同时又都是正确的。这并不是新方法，但用在分析孔子的政治思想上，却是近几年的事。即在政治上，既看到他保守落后的一面，又看到他同情人民的进步的一面。这两者虽然初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

2. 在中西文化对比中了解孔子思想特点。在探讨中西不同的思想方式时，有的说：“西方商业性社会是外向性、开放性的，经商要向外扩展……造成了西方人外向性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造成了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西方是向外探索的‘思物’”；“中国是反求诸己的‘思我’”。西方重视探求万物的因果关系；中国重视“省吾”和“慎独”的修养功夫（以上见《齐鲁学刊》1987年5期99页）。有的说：“西方注重抽象的逻辑推论，中国儒学注重体验了悟。”（《孔子研究》1986年3期16页）还有的说：“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表现出‘重伦理’的倾向；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表现出‘重认识’的倾向；二者的差异，如果追根探源就是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知’。”（《读书》1986年5期127页）

在分析世界上不同思想派系的特点时，有人看到，希腊注意考虑的是，世界最后的根据是什么，是原子呢？还是水或火呢？

中东基督教追求认识的是，世界和人类是谁造的问题；佛教追求的是，人的来生来世是如何的问题。孔子和儒家，既不注意人是怎么来的问题，也不关心人死了以后的事，它最注意的是，现在活在社会上的人如何做人。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有人说：“对西洋我有八个字，叫做‘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是‘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光明日报》1986年7月21日）中国群体观念强，西方个体观念突出，孔子就是以伦理学家而著称。

另外，有人还在先秦诸子的对比中来了解孔子。在比较中，确实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一些特点。

3. 用“释义学”的方法研究儒学。“释义学”是近年在西方出现的一门边缘学科。这门学科在解释古籍时认为，古籍中既有明显的意向，又有不明显的“蕴谓”。后人既应认清其明显原义，又应注意其不明显的“蕴谓”。并且认为“蕴谓”也不是一次就能认识完了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解释者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会有更深刻的“蕴谓”发现。所以“蕴谓”不是个封闭不变的常理，而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意向。实际上新“蕴谓”和它的发现者的认识水平是相一致的。这样，不仅“我注六经”是正常现象，而且“六经注我”也是必然的有意义的，是合乎“释义学”原理的。进而认为新发现的“蕴谓”，既有历史意义，也有新的时代意义。最近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儒家的道统，取得了有说服力的认识（详见《复旦学报》1988年5期《论儒家道统的释义学特征及逻辑》）。

4. 用教育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孔子的言论。有文章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不是一种愚民思想。因为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真情至性都是自然地“由之而不知”地存在着。而不是强化意识的结果。如“天真”问题，当别人叫他天真，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天真时，便不再是

“天真”了。不知道自己天真的“天真”，才是纯正的“天真”。人们做好事时，最好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去做，不要老意识到自己在做好事，老想着叫别人来感谢自己。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就是一种好的境界，不是一种“愚民政策”（见《百科知识》1989年2期文章）。

5. 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孔子。系统论是五十年代以后兴起的一门关于集合体（系统或体系）组成变化的学科。它认为任何体系都是由二个以上的互相作用互相联系的因素组成。这些因素组成的体系的功能，不是原有因素功能的相加，而是一个有新功能的新整体。新整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诸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样就构成了如下的原理方法，即认识事物时，要注意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等原理原则。有文章用这种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孔子，认为孔子的仁学已构成为一个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等因素组成，“诸因素互相依存、渗透或制约……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结构的特征不是四因素的相加，而是具有了一种新特征——“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式地抢救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性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践的特点，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这个结构是既有保守的主张，又有合理的因素；既有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又有鼓励人们埋头苦干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功能。这种分析确有启发作用。

6. 在继承问题上提出的几种方法。这主要有三种：即批判继承法、抽象继承法和“三分法”的继承法。前两种方法是人